

内部资料 注意保管

# 东亚经纬

2016年第4期

## 【本期要目】

|                                 |    |
|---------------------------------|----|
| ◆观察与思考.....                     | 1  |
| 如何解读中韩两国在历史文化问题上的纷争? (李宗勋)..... | 1  |
| 普京的访日对安倍外交所产生的影响 (尹虎).....      | 4  |
| 安倍访问夏威夷珍珠港的目的何在? (姜龙范).....     | 6  |
| 古代中日天狗形象研究 (姚琼).....            | 8  |
| ◆学术动态.....                      | 15 |
| ◆征稿启事.....                      | 21 |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工商大学 东亚研究院

2016年12月30日

## 如何解读中韩两国在历史文化问题上的纷争？

延边大学人文学院 李宗勋

近年来，韩国在文化遗产申报上动作积极，宫廷宗庙祭祀礼乐、江陵端午祭等先后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古代韩国处于中华文明圈，中韩两国传统物质文化颇有相似之处，故而，韩国传统文化成功申遗的消息传至国内便引发了国人热议，不少国人认为韩国是在“偷抢”中国传统文明成果。除了“申遗事件”之外，中韩之间在高句丽历史问题、东北工程问题上也存在纠纷。在此，笔者将围绕中韩间历史文化上的分歧问题进行探讨。

### 一、“申遗”问题

在韩国申遗中医、印刷术、端午等问题上，中国不少国民反应非常敏感，谩骂韩国人善于“偷抢”中国古代文化。对此，中国人其实不必那么大惊小怪，问题也不像有些中国人想象得那么简单。传统时代，朝鲜半岛上的国家一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并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汉字文化圈中发展壮大，成为东北亚区域的主要国家之一，历史上被誉为“礼仪之邦”、“小中华”。因此，两千多年间来自中国大陆的包括汉字在内的中国文化也成为朝鲜半岛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具有超越国家、民族向四周传播、交流的属性，越是先进的文化越容易传播，获得其他民族的关注。同时，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交流、受容、变异、本土化等诸多变化，于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化在朝鲜半岛经历长期的变异过程后，在内容上与原来的文化不完全一样，而且形成鲜明的本地特色，甚至还有名同义异的现象。就像起源于印度次大陆的佛教传播至中国大陆后变成中国式的大乘佛教一样。

比如，韩国申遗成功的端午祭，是韩国江原道江陵一带民间祭拜吉岭大神的民俗活动，并不是全国性的传统节日，内容上类似萨满文化的成分多一些，与中国的端午节完全不一样。韩国善于将传统文化中认为有价值的、具有民族与地区特色的部分进行挖掘、整理、研究和保护，只是中国忽略了这些内容，还没有来得及整理而已。中国人应以自然的心态对待这种问题。其实，中国文化向其他地区和国家传播并能发扬光

大更能彰显古代中国文化魅力和影响力，更加体现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中国人应为之骄傲才是。

## 二、高句丽历史问题

据史料记载，高句丽国始建于公元前37年，其疆域包括现今中国辽宁、吉林两省和朝鲜半岛北部，公元668年被唐罗联军所灭。中韩两国学界在高句丽问题上的分歧较大。中国学界大多学者认为，高句丽自始至终是中国东北少数民族政权，是中国中原王朝的地方政权，因此主张将高句丽史完全归属于中国史的范畴内。甚至有的学者反对将高句丽视为韩国史的一部分，强调高句丽史不应写进韩朝古代史中。韩国学界则认为，高句丽史是古代韩民族历史的主干，是政治军事上的独立强国，高句丽人是韩民族的直接祖先，强调中国学界对高句丽史的主流观点是对韩国历史的武断歪曲。

笔者对高句丽历史的定位是：高句丽史是古代东北亚的历史，不能简单地将高句丽的全部历史归属于中国史或韩国史。因为在古代东北亚，根本不存在明确的国境线，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国民国家，各王国内的民族大多也是复合性的征服民族，各族群、部族之间的相互移动、融合比较频繁。既然高句丽是东北亚历史，中国和朝韩应共享这种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残留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高句丽历史遗产共同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正是很好地体现了两国共同享有高句丽历史的精神和思维。如果中韩两国皆视高句丽为古代东北亚历史的话，两国之间不会就此产生文化冲突。

从国史角度而言，高句丽史必然是中国东北古代历史的一部分，因高句丽及其先祖夫余都起源于现中国的辽宁、吉林地区，高句丽时期的大部分疆域也在现在的中国东北地区，在东北地区活动的时间大大多于朝鲜半岛，只是后期将政治中心迁到朝鲜半岛而已。

但我们还应承认，高句丽的历史文化后来主要由朝鲜半岛传承，并使之发扬光大，高句丽人是朝鲜民族形成的重要族源之一，因此朝鲜民族的英文名称仍然是KOREA（高句丽的谐音）。相对于高句丽史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小部分而言，高句丽历史在整个朝鲜民族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唐朝，韩国的高句丽历史情结比较强烈也是自然的。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和朝韩在高句丽历史问题上相互理解，基本上采取了共享高句丽历史和默认对方研究方法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太大的矛盾。

## 三、中国史学界“东北工程”问题

世纪之初，中国学界实施“东北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简称“东北工程”）的本

意是要加强中国东北诸问题的研究，因为东北地区历史文化及现状研究一直以来确实是我国学界的薄弱环节，以往的研究大多受日本帝国主义时期日本学者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半岛学界影响。也就是说，在东北历史文化及现状研究上中国学界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体系和理论基础，启动“东北工程”这样的大型项目对实现上述目标完全是必要的。

但中国在实施“东北工程”过程中，在动员、组织形式及运作上带有一些官方色彩，学术上的政治倾向性有些明显，比如：“工程”有一些政府高级官员参与，在研究尚未成熟前急于在党的机关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高句丽的文章，以明确表明中国的立场，中国外交部网站介绍韩国历史文化中的古代史部分突然被删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的观点发生180度转变等。这些情况引起韩国学界和社会的高度警觉，认为中国政府以学术为幌子来实现对朝鲜半岛的政治目的。

韩国媒体在没有完全搞清事实原由的前提下，在国内大肆炒作高句丽等历史问题，对“东北工程”肆意夸大其词，使高句丽问题在整个韩国社会高度发酵；以民间学派为主的各学术团体纷纷组织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严厉抨击中国学界歪曲历史和搞文化霸权主义；更有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和战略研究者认为，中国实施“东北工程”实际是为在朝鲜内部发生突变时控制北朝鲜预作理论上的准备。韩国政府多次在外交场合都严正提出“东北工程”问题，要求中国政府予以妥善解决。

后来经中韩双方的外交努力，通过两国学者及研究机构间的直接交流，以及有关各方的相互克制，中韩之间的文化冲突及外交摩擦暂时得到缓解。双方政府及学界在“反对学术问题政治化，历史问题现实化”的原则上达成共识，并共同强调不能因历史等学术问题影响中韩两国友好关系的大局。

一言以蔽之，经历“申遗”问题、高句丽历史问题、“东北工程”问题等风波后，目前中韩两国学界相互克制并谨慎地对待这些历史文化领域的冲突。尽管如此，这并不说明这些问题不会再重新凸显。中韩两国只有在共同树立古代东北亚历史意识的基础上，真正采取历史共享的研究态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历史文化领域的纠纷。

# 普京的访日对安倍外交所产生的影响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尹虎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时隔 7 年多的访日，也是俄罗斯总统近 11 年以来首次对日本进行的“工作访问”，因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普京此次访日不仅对安倍政府的对俄领土、经济、外交等政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对今后日俄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其中，值得关注之处有以下几点：

## 一、提高了国民对安倍政府外交能力的评价

早在 2014 年 2 月 10 日，安倍访问俄罗斯索契与普京会面之时，双方已就普京访日一事达成一致意见。后因日本实施对俄制裁，梅德韦杰夫访问“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等原，这一计划不得被搁置。尽管日俄双方围绕访日规格等问题出现了分歧，没有取得安倍预想的成绩，但普京访日能够实现，这一结果本身反映出日俄关系有所好转，也说明安倍的对外外交努力取得了一定突破。促成普京访日成为了安倍政府的外交政绩，有助于提高国民对安倍政府外交能力的评价。

## 二、有利于安倍对俄外交在今后的开展

2012 年 12 月，第二届安倍政府执政后，安倍积极与俄罗斯就北方四岛问题展开磋商，并寻求与普京建立友好私人关系。安倍分别于 2013 年 4 月、2014 年 2 月、2016 年 5 月和 9 月四度访俄。根据外交惯例，关系对等的国家首脑应当交替互访，然而普京却因各种原因并未进行过回访。对此，日本国内不少民众开始批评安倍对俄外交是“乞讨”式外交。此次普京的访日，能够缓解此种批评，这为安倍实施更为积极的对俄外交政策打下了良好基础。

## 三、进一步完善了有关日俄关系“新思路”的政策设计

2016 年 5 月第二次访问索契期间，安倍与普京进行了“单独会谈”，并在会谈中提出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新思路”。尽管目前为止，其内容还没有被正式公开，但安倍

所称的“新思路”很有可能参照了“川奈提案”或“伊尔库茨克声明”，即要求俄罗斯先归还齿舞岛和色丹岛，缔结日俄和平条约，而作为交换日本提供经济和外交支持。

11月19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安倍与普京再次围绕“安倍新思路”展开了磋商，但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果。普京的此次访日又一次向安倍提供在“主场”日本，说服普京接受包括北方四岛领土问题在内的和平条约缔结谈判的机会。虽然近年来安倍的“新思路”越来越体现出妥协的一面，但是在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抬头的背景下，普京在此次访问中依然没有采纳这一“新思路”。尽管如此，日俄围绕“新思路”的磋商，加深了双方的相互理解，同时完善了安倍“新思路”的政策设计。

#### **四、扩大了日俄间经济合作的规模**

安倍政府希望率先实施基于俄方需求的经济合作，以便使包括归还北方四岛领土在内的和平条约缔结谈判有所进展。2016年5月，安倍还向普京提出了8项经济合作计划，欲通过人员交流、医疗、尖端技术、能源、城市建设、中小企业、产业振兴、远东开发等领域的合作，加强日俄间的伙伴关系。日俄两国已于11月18日就8项经济合作具体制定了工作计划，预计年内陆续启动磋商以付诸具体实施。普京的访日将进一步推动两国间经贸关系的发展，加快合作进程。尽管普京和俄政府官员普遍持“一码归一码”的态度，但安倍准备的8项经济合作计划，有其正面影响，有助于形成推进领土争端谈判的有利氛围，。

#### **五、有利于符合日本利益的日美关系的形成**

美国十分关注日俄关系的变化，不愿看到日本与俄罗斯交往过密。2016年2月9日，奥巴马曾通过电话劝阻安倍访俄，同时对安倍的俄罗斯政策表达了不满。由此可见，日本对自身全球定位的重新调整，将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特朗普当选美国下任总统后，围绕“TPP问题”和“驻日美军驻留经费问题”，日美之间出现了不协调的声音。在此背景下，安倍积极促成普京访日，对美国形成了无形的压力，并向美国传达出“美国的战略决策应充分考虑日本利益”的信息。这也将有助于今后日本在日美关系的发展中获得更多利益。

可以说，此次普京访日是日俄两国相互妥协的结果，更是离不开安倍的积极争取。此次普京的访日仍没能就“北方四岛”领土问题的解决取得实质性进展。今后还是需要日俄两国拿出足够诚意，建立长期、稳定的互信关系，方可有回转之机，但目前的日俄关系远未达到这一程度。

# 安倍访问夏威夷珍珠港的目的何在？

天津外国语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姜龙范

安倍首相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至 28 日访问美国夏威夷，在珍珠港为当年战争牺牲者慰灵，并与奥巴马总统进行了首脑会谈。安倍是首位访问珍珠港悼念珍珠港事件遇难者的在任日本首相，这样的背景使安倍的此次访美具有历史性意义。

早在今年 5 月，奥巴马总统实现广岛访问之后，美日双方人士就曾提出安倍“回访”珍珠港的想法。今年又恰逢日本偷袭珍珠港 75 周年，夏威夷将举行较大规模纪念活动，作为“礼尚往来”，安倍访问夏威夷，显得十分“合乎情理”。然而，安倍对访问珍珠港表现出较谨慎的立场，并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奥巴马访问广岛之时，引导国内舆论围绕“道歉问题”进行广泛探讨，先派夫人安倍昭惠于 2016 年 8 月访问夏威夷珍珠港，以此把握国内民众的反映，而且，有意避开日本偷袭珍珠港的 12 月 7 日，将访问日期选在圣诞节假期等都说明了安倍政府的用心良苦。显然，安倍的此次访问并不像众多媒体评论的那样是“突然”的决定。只是因美国大选特朗普获胜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的影响以及为了在奥巴马离任前形成“回访”的局面，其政策显现出仓促的一面，给予世人“突然”的感觉而已。

安倍访问珍珠港并不意味着他个人史观有何变化，访问期间，他也没有就偷袭珍珠港这一事件进行道歉。此次访问其目的在于巩固美日同盟，同时向正从奥巴马时代进入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发出多种政治信号。可以说，安倍访问珍珠港的意图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

第一，扩大外交成果。进入 2016 年后，安倍在外交领域大动作不断，取得一定成果。主办 G7 峰会，促成奥巴马访问广岛，与韩国签署有关慰安妇和军事情报的协定，实现邀请普京访日的计划等，都体现出安倍政府对外交战略的关注。战后 71 年以来，从未有日本首相访问珍珠港，更无为当年牺牲者“慰灵”先例。所以，安倍这次的这个决定，颇受瞩目。安倍的此次访问明显有着进一步扩大外交成果，同时彰显其领导魄力，提高国民支持的意图。

第二，解消美国对安倍历史认识的“误解”。安倍第一次执政以来，美国舆论普遍对安倍的历史认识表现出质疑。为了淡化来自历史认识的不利影响，安倍作了积极努力。例如，2015 年 4 月在哈佛大学和美国国会的演讲中，安倍曾极力辩解自己不是历史修正主义者。安倍政府认为，此次的珍珠港访问将有助于展示安倍在历史议题上的和解态度，消解美国国内对于安倍历史认识的担心和批评，争取美国国内更多支持。

第三，缓和与奥巴马间的矛盾，关注民主党因素。近年来围绕日俄关系的走向，安倍和奥巴马间出现了一定隔阂。奥巴马还曾在今年 2 月的电话会谈中要求安倍谨慎考虑 5 月的访俄计划，向安倍施了压。不仅如此，11 月 17 日，安倍与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的会谈，更是引起了奥巴马政府的强烈不满。安倍决定访问夏威夷，并与奥巴马进行会谈，这将有助于淡化相互间的矛盾，可为奥巴马的外交成绩“添砖加瓦”，也能为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日同盟关系画上“和睦”的句号。同时，安倍的这一访问，也能为今后自民党与美国民主党两党关系的发展形成有利条件。

第四，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安倍的珍珠港访问，体现出日本愿意基于日美间的历史和解和现在的纽带，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的立场。通过此次访问，安倍与奥巴马再次确认了美日同盟的价值，把握美日关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同时向世界展示美日同盟的牢固程度。

第五，向特朗普发出基于日本利益的政治信号。安倍访问珍珠港，积极构筑紧密的美日同盟的这一做法，能够体现安倍对美国的重视和希望巩固美日同盟关系的强烈愿望，可形成对下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间接“求爱”的效应。另一方面，在特朗普持续要求日本增加负担驻日美军费用，并宣称退出 TPP 的背景下，安倍通过访问珍珠港，也向特朗普间接强调了美日同盟的价值和重要性，体现出欲牵制特朗普改变当前美日同盟“和谐”局面的意图。

一言以蔽之，作为战后第一次日本首相的珍珠港访问，安倍的此次访问，显然对日美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安倍的珍珠港访问体现出了其明显的现实主义外交的特征，表现出了其对当前美日同盟关系和未来走向的立场和诉求，对今后美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 古代中日天狗形象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姚琼

根据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天狗不仅是代表不祥的星象，还是一个食人肝血，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的妖怪。然而天狗被传到日本之后，无论是其形象还是它所代表的意象都发生了变化。本文以分析古代中日两国天狗形象的异同为内容，并试图分析其中原因。

## 一、中国古代天狗形象

### （一）星象天狗

对于作为星象的天狗，中国古文献中较早的记录为《史记》中的记载，“太白五芒出，早为月蚀，晚为天矢及彗。其精散为天杵、天櫛、伏灵、大败、司奸、天狗、贼星、天残、卒起星，是古历星”<sup>①</sup>。在此之后《汉书》的记载中，将天狗描述为流星，并对其具体形状亦有所描述，“星有尾，旁有彗，下有如狗形者，亦太白之精。有声，其下止地，类狗。所坠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圜，如数顷田处，上锐，见则有黄色”<sup>②</sup>。根据此条记录，天狗的出现会伴随不祥之象，是个具有“千里破军杀将”作用的星象。《续资治通鉴》中亦对天狗流星的具体形状有所描述，“冬，十月，丁未，大名路有星如火，从东南流，芒尾如曳箕，堕地有声，火焰蓬勃，久之乃息，化为石，青黑色，光莹，形如狗头，其断处如新割者。有司以闻，太史验视云：‘天狗也。’命藏于库。”<sup>③</sup>此外，《宋史》对此亦有所记载，“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东西横行亦曰流。流星有八，曰天使，曰天晖，曰天雁，曰天保，曰地雁，曰梁星，曰蕾头，曰天狗。流星之为天使者有祥有妖，为天晖、天雁，夜陨而为天保，则祥；若夜陨而为地雁、梁星，昼陨而为蕾头，则妖，流星之大者为大奔星，夜陨而为天狗，厥妖大。”<sup>④</sup>由此可见，天狗是在夜间陨落的流星的一种，且具有妖性。

进入晋朝，对天狗乃不祥星象的记载更加丰富，东晋升平二年（358）十二月“枉矢自东南流于西北，其长半天。四年（360）十月庚戌，天狗见西南。占曰：‘有大兵，流血。’”<sup>⑤</sup>另有，东晋太元十三年（388），“天狗东北下，有声。占曰：‘有大战，流血。’”

<sup>①</sup> 《史记》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63年，第一三三五页。

<sup>②</sup> 《汉书》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63年，第一二九三页。

<sup>③</sup> 《百衲本二十四史·续资治通鉴》第二百十三卷，中华书局，1936年。

<sup>④</sup> 《百衲本二十四史·宋史·志》卷五十二，第五卷，中华书局，1936年。

<sup>⑤</sup> 《百衲本二十四史·晋书·志》第三卷，中华书局，1936年。

自是后，慕容垂、翟辽、姚萇、苻登、慕容永并阻兵争强。”<sup>①</sup>的记录。南北朝之后，天狗星象出现之时即有将死兵败之迹，诸如此类的记载更是频繁地出现在文献中。《宋书》有载，“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大如斗杆，尾长十余丈，从西北来坠城内，是谓天狗。占曰：‘天狗所坠，下有伏尸流血。’”<sup>②</sup>《隋书》中亦有记载，“军有黑气如牛形，或如马形，从气雾中下，渐渐入军，名曰天狗下食血，则军破。”<sup>③</sup>《南史》记载，“有流星长十余丈从西北来城内，是谓天狗。占曰：‘天狗所下，有伏尸流血。’”<sup>④</sup>《续资治通鉴》亦有载，“有大星坠西南，光烛地，有声如雷，占者曰天狗。同知谏院范师道言：‘天狗所下为破军杀将，宜择将帅，训练士卒。’”<sup>⑤</sup>除了战乱中象征兵败之象，看到天狗星象也被认为会发生不祥之事。如《太平御览》中记载了天狗星象的出现会引发天下饥荒，瘟疫流行，群臣惨死的悲惨景象。

由以上中国古代文献中对天狗的记载可以将中国古代作为星象的天狗形象总结如下，天狗作为星象初期在古人的认识中是一种夜间出现带有声响的流星，汉代之后天狗这颗流星开始具有一定的妖性，魏晋南北朝开始天狗的妖性慢慢被扩大，逐渐演变为会引发兵败、瘟疫流行乃至社会动荡的不祥之象。

## （二）妖怪天狗

较早对天狗的具体形象有所描述的是《山海经》，《西山经》的《西次三经》中有载，“又西三百里，曰阴山。浊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蕃泽，其中多文贝。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御凶。”明代蒋应镐版的《山海经〈图绘全像〉》中按照此条记录绘制出了天狗的形象。另有清代汪绂版的《山海经存》亦增加了天狗的绘图。根据《山海经》的记载，天狗有御凶的作用，这与在星象中天狗被认为不祥之象的形象有所差异。然而《山海经》之《大荒西经》中记录了“天犬”这一动物，并对其解释“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也就是说天犬的出现会引发战争，这与《山海经》之后的文献对天狗星象引发兵败的记载是一致的。因此，被认为有不祥之象、可以带来战争的天狗，最初很可能来自“天犬”。除此之外，万历十九年（1591）黄一正所编《事物纪原》中，对天狗的形象也有一定的记载，“云，天狗如狸，白首，音如猫，食蛇”。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仅能大致对天狗的形态有所了解，但关于天狗的具体形象仍然较为模糊。

直至隋唐开始，随着天狗谣言的流传，我们对天狗的形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根据记载，天狗这个妖怪常在夜里出现，人们谣传只有取人的肝脏和血才能安抚天狗的

<sup>①</sup>同上。

<sup>②</sup>《百衲本二十四史·宋书》第七十九卷，列传第三十九卷，中华书局，1936年。

<sup>③</sup>《百衲本二十四史·隋书》第二十一卷，志第十六卷，中华书局，1936年。

<sup>④</sup>《南史》第十四卷，中华书局，1975年。

<sup>⑤</sup>《续资治通鉴》第五十八卷，中华书局，1975年。

作乱。如《隋书》中有载，“天厌乱德，妖实人兴，或空裹时有大声，或行路共传鬼怪，或剖人肝以祠天狗，或自舍身以厌妖讹。”<sup>①</sup>像这样谣传取人肝血以祭天狗的记载，隋唐之后的文献也多有出现。《南史》有记载，“夏六月，都下讹言有柀柀，取人肝肺及血，以饴天狗。百姓大惧，二旬而止。”东魏五年（538），甚至出现了天子要取人肝脏以祀天狗的记载，“是岁，都下讹言天子取人肝以饴天狗，大小相警，日晚便闭门持仗，数月乃止。”<sup>②</sup>到了贞观十七年（643），民间开始流传官员派遣柀柀恶鬼取人内脏以祭天狗，传言中恶鬼柀柀身披狗皮，铁爪，于暗中取人内脏而去。于是人人自危，或备弓箭自防，无兵器者则削竹以备，无人独自行走于郊外。唐太宗听闻此谣言后大怒，命人通夜开堵坊门，并宣旨慰谕，终于终止了此谣言<sup>③</sup>。

从这些记录取肝祭天狗谣言的记载来看，在这些谣言中，并没有出现天狗的具体形象，只是描述了天狗食人肝血的这一特征。对于天狗谣言的产生原因，有学者从社会学和伦理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盛世下潜在政治危机的担忧，同时天狗的这种谣言体现了当时以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学术思想、以佛道为首的宗教神秘主义、包括谣言在内的封建迷信等社会思想对大众的深刻影响。<sup>④</sup>

## 二、日本古代天狗形象

天狗的形象不仅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日本也吸收了天狗的形象，然而与中国方面的天狗形象有所不同的是，日本将天狗与佛教、修验道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日本文化特点的天狗形象。天狗的形象在日本平安初期开始出现，但尚未具有具体的形象，到了平安时代后期天狗演变为居住在深山中，妖惑人心，拥有多变形态的妖怪。镰仓时期之后，天狗多鸢鸟形象出现，手持羽扇，其正身为遭遇不幸而离世的天皇、贵族和僧侣，带着对世间的仇恨扰乱政权。在此之后，到了江户时期，日本的天狗形象发展为赤颜高鼻的大天狗，成为灵山信仰的对象。

### （一）反佛天狗

相对于中国古代文献贯穿始终地关于天狗星象的记载，日本方面对于天狗星象的记载并不多。最初在《日本书纪》中有载，舒明天皇九年（637），“春二月丙辰朔戊寅，大星从东流西。便有音似雷。时人曰，流星之音。亦曰，地雷。于是，僧旻僧曰，非流星。是天狗也。其吠声似雷耳”。<sup>⑤</sup>同年，《日本书纪》中出现了日蚀和虾夷之乱的记

<sup>①</sup> 《百衲本二十四史·隋书》第五十五卷，中华书局，1936年。

<sup>②</sup> 《百衲本二十四史·南史》第七卷，中华书局，1936年。

<sup>③</sup> 根据《百衲本二十四史·新唐书》第三十五卷，中华书局，1936年。

<sup>④</sup> 参考周能俊：《汉唐“天狗”考释》，《阅江学刊》，2012年第1期，第76-78页。

<sup>⑤</sup> [日]《日本书纪》，经济杂志社，1917年，第483页。

载，在此前一年的舒明八年（636），同样在《日本书纪》中记载了日蚀和饥荒。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文献中初期的天狗星象基本继承了中国天狗不祥之星象的形象，同样认为天狗星象的出现是灾祸出现的迹象。然而，到了平安时代，日本的天狗就开始出现与中国天狗不同的形象。这时的天狗开始与佛教结合，经常扰乱佛教子弟的修行，却最终受治于佛教。关于记载天狗与佛教相结合的文献，最为显著的要属成书于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佛教说话集《今昔物语集》中对天狗的记载了。

日本说话集《今昔物语集》卷二十“本朝佛法”中记载天狗的卷目分别有：天竺天狗闻海水音渡此朝语第一、震旦天狗智罗水寿渡此朝语第二、天狗现佛坐木末语第三、祭天狗僧参内裹现被追语第四、仁和寺成典僧正值尼天狗语第五、佛眼寺仁照阿闍梨房托天狗女来语第六、染殿后为天狗被烧乱语第七、良源僧正成灵来观音院伏余庆僧正语第八、祭天狗法师拟男习此术语第九、龙王为天狗被取语语第十一、伊吹山三修禅师得天狗迎语第十二。<sup>①</sup>关于《今昔物语集》中天狗故事的内容，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在此不再赘述。<sup>②</sup>这几则故事中的天狗形象多变，时而化作观音现身在树上扰乱修行人，时而化作佛像假意引渡禅师，又时而化作女尼姑诱惑高僧。天狗这种扰乱修佛人的行为显示出其反佛的形象。《今昔物语集》的内容主要为通过荒诞怪异的故事向民众宣扬佛法教义，因此天狗对佛教禅师的一系列扰乱行为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在《今昔物语集》对天狗的记录中还出现了天狗最后被佛法收服，成为修佛人的故事。

## （二）鸢鸟天狗

日本天狗的形象不仅出现在文献中，一些绘画作品更是直接生动地描绘出天狗的形象。进入镰仓时代以后，在一些绘卷中出现了长着巨大的翅膀，拥有尖尖的喙和锐利爪子的鸢鸟天狗形象。鸢鸟天狗通常与佛教结合，有着破坏佛教僧侣修行的反佛形象。在众多描绘鸢鸟天狗的作品中，内容较为丰富，刻画得较为形象的要属创作于镰仓时期的《是害房绘》。

《是害房绘》是以《今昔物语集》中“震旦天狗智罗永寿渡此朝语第二”为内容的绘卷，其中展现了中日天狗同时出现的场景，它主要描述的内容是大唐的天狗是害房来到日本后，挑战日本比叡山的僧人最后以失败告终的故事。现今保存最完整的《是害房绘》是曼殊院所藏创作于延庆元年（1308）的版本，其中一共描述了三副大唐天狗与日本高僧比武的场景。这些场景的内容大致如下，首先，康保三年（966）大唐而来的天狗是害房意欲将日本引入魔道，在日本天狗爱宕山的日罗房的协力下变身老法

<sup>①</sup> [日] 黑板胜美：《新订增补国史大系：今昔物语集》，东京：吉川弘文馆，530-552页。

<sup>②</sup> 郑婷婷、曲朝霞：《浅析〈今昔物语集〉中的天狗故事》，《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18期，第92页-98页。[日] 森正人：《天狗と仏法》，《今昔物語集の生成》大阪：和泉书院，1986年，213-227页。[日] 知切光歳：《天狗の研究》，东京：大陆书房，1975年。

师的模样，不巧遇到了正好下山的余庆律师。被不动火界咒余庆律师所持铁火轮袭击后的是害房失败后逃走。接下来是害房又企图袭击寻禅权僧正，然而一路受到金迦罗和制多迦童子的追赶，最终依然以失败逃跑告终。在最后的场景中，大唐天狗是害房这次遇到了天台座主慈惠大师良源，然而被护法童子打到无法站立，最后被日罗房的卷书们抬到加茂的河原。在接受了十七天的治疗后终于恢复的是害房，对日本天狗谢礼后离开。在《是害房绘》所描绘的三个场景中，中日天狗在形象上并无差异，都是以鸢鸟的形象出现在画卷中。<sup>①</sup>

与《是害房绘》同时期成立的还有《是害房绘词》，其内容同样是以《今昔物语集》卷二十中“震旦天狗智罗永寿渡此朝语第二”的内容为模板的记录。然而与《今昔物语集》的记载有所不同的是，《是害房绘》中震旦天狗的名字是“是害房”，而《今昔物语集》中的表述是“智罗永寿”，除此之外，《是害房绘》下卷有几则日罗房与被良源击退的是害房的对话场景，为天狗故事增添了几分趣味性。<sup>②</sup>

### （三）鼻高天狗、大天狗

中世之后，随着天狗传说的流传，开始出现鼻高天狗或称为大天狗。这种天狗拥有强大的神通力，被认为是佛僧与修验者死后的化身，因此大天狗比其它天狗的功力更为强大。创作于江户中期的《杂说囊括》中，记载了分别居住在各个大山中的八天狗的故事，它们分别是爱宕的太郎坊、鞍马的僧正坊、比良的次郎坊、饭绳的三郎、大山的伯耆坊、彦山的丰前坊、大峯的前鬼坊以及白峯的相模坊，这八个天狗又被称为“大天狗”。另外还有江户中期密教祈祷秘经《天狗经》中描绘了“四十八天狗”，其中包括了部分八天狗。

大天狗以拥有长长的鼻子，且形态为半人半鸟的形象多见，然而这一形象并不统一。现存于京都鞍马寺，相传由狩野元信所作《鞍马大僧正坊图》中，描绘了鞍马的僧正坊大天狗的形象，与其它大天狗形象有所区别，这幅图中的天狗犹如一位年迈的长者，花白的胡须，完全区别与鸢鸟天狗以及鼻高天狗的形象。除了鞍马僧正坊天狗，饭绳三郎天狗也与其它高鼻大天狗的形象有所区别，多以后背有火焰状装饰，右边持剑左手持绳索，脚踩白狐的形象出现。

此外，进入江户时代，天狗传说的大范围流行引得一批浮世绘画师们将与天狗有关的传说故事搬入了自己的画卷中，天狗也成为了浮世绘作品经常出现的形象之一。在河锅晓斋所绘《天狗集会之图》中，描绘的是一群站在画前品头论足的天狗，这里的天狗代表的是对绘画作品毫无鉴赏能力的伪评论家。另有月冈芳年所绘《武勇雪月

<sup>①</sup>根据 [日] 梅津次郎编：《新修日本繪卷物全集 27 天狗草紙是害房绘》，東京：角川書店，1978 年。

<sup>②</sup>对《是害房绘》与《今昔物語集》中天狗故事描述的分析，可参考 [日] 久留島元：《「是害房繪」の成立》，《同志社国文学》，2012 年 3 月。

花之内五条之月天狗牛若丸》，描述的是白峯相模坊（白峯天狗）手持佛仗与西塔武藏坊办庆、饭纲三郎天狗决斗的场面，图中半人半鸢形象的白峯天狗头顶黑帽，身披青衣，瞪大双眼，手持佛仗正在奋战。

二代春章的锦绘《源义仲四天王与木曾奥山退治天狗》，描绘的是源义仲四天王与木曾于奥山将天狗治退的故事，锦绘中的天狗妖怪是鸢鸟天狗的形象。这些浮世绘中的天狗，大都是法力高深的大天狗的形象，虽形态各有不同，但都是拥有高强法力的大天狗。江户时代中期以后，一些得道高人死后变成天狗，成为有预知千年的神通力，坠入魔界天狗道的仙人天狗。另外，祭祀天狗的神社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这些神社大多是根据各地关于大天狗的传说而建造，神社中的大天狗与修验道相结合，成为人们供奉的对象。

### 三、总结

天狗，形成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最初是一种出现在夜间会发出声响的流星，之后这种流星被认为会引发兵败等不祥之象。同时，天狗也是一种妖怪，最初有御凶的作用，但受到流星天狗不祥意象的影响，转变为食人肝血，引发社会动荡的妖怪。天狗不仅出现在了中，还漂洋过海来到了邻国日本。日本的天狗，在初期阶段继承了中国天狗星象以及引发社会动荡的妖怪形象。然而，平安时期之后，日本的天狗与佛教相结合，形成了扰乱佛家僧侣修行的反佛形象，形态上则是长着尖尖的喙，拥有一对翅膀的鸢鸟形象。中世之后，日本的天狗又与修验道相结合，开始拥有更加丰富多变的形象，在法力上也更加强大，不仅是众多物语故事和浮世绘的主角，还成为了神社中人们供奉的对象。

中日天狗在形成的初期阶段形象几乎一致，都是代表不祥之象的流星，同时也是引发社会动荡的妖怪。但到了中期阶段，中日两国的天狗形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国的天狗演变为谣传中食人肝血，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的妖怪；而日本方面，则与佛教相结合，演变为具有一定的法力，试图破坏佛家禅僧修行的鸢鸟形状的妖怪，到了江户时期更是发展成法力高强，坠入魔界的仙人天狗，甚至进入神社成为人们供奉的对象。从形象变化上来看，日本天狗的形象更加生动、具体，不仅有鸢鸟的具体形象，还有由鸢鸟发展变化的各个大天狗的形象。这与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的发展和流行不无关系，天狗作为形象生动的妖怪，在这一时期成为浮世绘作品的创作对象之一，这使得现在的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绘画作品一览日本天狗的形象。另一方面，日本天狗与佛教、修验道相结合，演变为鸢鸟天狗、大天狗等形象，这与日本自平安时期对佛教的大力推崇有很大的关系。平安时代开始，天狗妖怪的传说经常出现在传颂佛教道义的

物语集中，其中广为人知的就是《今昔物语集》中的天狗故事。这些物语集旨在通过各种奇异故事向世人宣扬佛家思想，而天狗的妖怪形象也被吸收进去，成为典型的反佛形象。

## 学术动态

# “鸠摩罗什与东亚知识的迁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

2016年10月17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泰国国际佛教大学联合主办的“鸠摩罗什与东亚知识的迁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



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魏查理（Charles Willemen）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特聘教授顾彬（Wolfgang Kubin）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索罗宁（Kirill Solonin）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谢林德（Dennis Schilling）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郭栖庆教授，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法音》编辑部主任桑吉扎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社长、黄夏年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执行所长张风雷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史馆馆长姚胜教授等参加了研讨会议。



研讨会围绕“鸠摩罗什与东亚知识的迁移”议题展开研讨，李雪涛院长、魏查理教授、王邦维教授分别就鸠摩罗什的生平、佛教思想、佛经翻译，以及鸠摩罗什带来的新学知识等发表了自己的研究心得。

鸠摩罗什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论师、译师。所译经论对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此次“鸠摩罗什与东亚知识的迁移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对今后鸠摩罗什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信息来源：菩萨在线）

## 东亚人文学会第 17 届国际学术大会在衡水学院主办

2016 年 10 月 21 日至 22 日，东亚儒家与董仲舒思想暨 2016 东亚人文学会第 17 届国大会在衡水学院召开，本次会议由衡水学院、韩国东亚人文学会、大丘史学会共同主办，衡水学院董子学院承办，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协办，自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130 多名学者参与学术交流并发表论文，重新定位董仲舒地位影响。会议围绕“文史哲视野中的东亚儒家思想——以董仲舒为中心”，分别从文学、哲学、史学等多角度、多层次对儒学，尤其是董学进行了深入探讨，对董仲舒的地位、影响进行了重新定位，并对其思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的周桂钿教授、人民出版社的金春峰教授、韩国釜山大学的金洪永教授、四川大学的张勇教授、韩国大邱韩医大学的南基守教授分别做了主题演讲。金春峰教授认为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史记》《汉书》一样，都是汉代人文史学的杰出代表；金洪永教授指出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道义思想对

韩国儒贤影响深远；张勇教授认为董仲舒不仅是“群儒首”“儒者宗”，也是“儒教始”；南基守教授从探讨人文治疗入手，指出人文治疗的根基可从阴阳学理论中找到，而阴阳学理论正因有了董仲舒，才作为一种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信息来源：衡水在线）

## 第五届东亚史料研究编纂机关学术会议在东京举行

2016年11月7日到10日，第五届东亚史料研究编纂机关国际学术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历史资料的编纂与研究资源化”，参加会议的有中国、韩国和日本三国的学者、代表，共计20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周溯源研究员、档案馆馆长马忠文研究员及办公室李长生主任、图书馆李然副馆长应邀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围绕档案文献和史料的搜集、保管储存、版本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学术交流。



周溯源副所长在开幕致辞中指出，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历史记载和历史研究的国家。中国的史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他们大多有高尚的追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治史理念至今影响着中国史学家。中国自古有尊史、重史、学史、研史、用史的传统，高度重视史学的作用。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先生，既是政治家，也是史学家，他有渊博的历史知识，通

晓丰富的历史智慧。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代理委员长朴汉男女士代表韩方致辞，她回顾了第四次会议以来韩国学者所做的各项工作，对新的学术交流充满期待。

两天的研讨活动中 15 位代表相继宣读学术报告。中方代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卜键先生做了《清史纂修的史料准备》的学术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长马忠文就近代史所藏黄元蔚档案中关于中日关系的史料及其价值做了专题报告，这批珍贵的资料反映了民初中国各界与日本关系的一个侧面，档案中部分内容为日文原始资料，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

日本和韩国学者发表的学术演讲涉及内容也很广泛，反映了两国学界有关史料编纂研究的新收获，有很多中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学习。会议期间部分代表还参观了反映日本皇家文化特色的京都御所和保存着近卫家族历史文献的阳明文库。在会后举行的理事会上，决定第六届东亚史料研究编纂机构国际会议定于 2018 年 10 月下旬在北京举行

（信息来源： 近代中国研究）

## 第一届东亚日本研究者国际学术会议在韩国举行

2016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第一届东亚日本研究者国际学术会议”在韩国仁川市松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东亚日本研究者国际学术会议”由首尔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台湾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等发起成立。



此次会议旨在增强东亚地区日本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提高东亚地区日本研究的学术质量。据悉，该会议今后将在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或地区轮流举办。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东京大学、首尔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台湾大学等 37 个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的 200 多名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专家赴会。

（信息来源：东华大学）

## 第 13 届东亚农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2016 年 12 月 23 日，由中国农业历史学会、日本农业历史学会、韩国农业历史学会共同主办，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办的第 13 届东亚农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 3 届中华农耕文化研讨会日前在南京顺利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国 70 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 15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与会专家、学者紧紧围绕“全球视野下的东亚农业文明”这一主题展开研讨。



王一民副馆长在致辞时指出，从 2001 年开始至今，东亚农史会议已历 12 届，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定期举办、有巨大影响力的重要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全球视野下的东亚农业文明”。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这一主题很好地体现了东亚农业文化的共同主题。他在致辞中进一步指出，我们是在研究历史，同时也是在书写历史，真诚地希望东亚各国悠久的农业文化交流事业开拓出更加宽广的合作领域，使东亚农业文明生发新芽，结出硕果。

研讨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佟屏亚研究员、日本北海道大学白木沢旭见教授、韩国全北大学苏淳烈教授分别以“全球视野下华夏稻作技术的贡献及其

危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华北地区的农业问题”“韩国现代农业技术的转变”为题作大会主题报告。主题报告会由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王思明博士主持。在为期两天的日程中，中日韩的专家学者们分为6组作了40余个学术交流报告，充分讨论交流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会议还决定，第14届东亚农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将2016年9月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举行。

（信息来源：农业资讯）

## 《东亚经纬》征稿启事

《东亚经纬》是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面向全国相关机构内部发行的学术季刊。

本刊以研究“东亚学”理论，探讨东亚地区热点问题，分析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走势，传递海内外“东亚学”研究动态及信息为己任，开设“观察与思考”、“名家访谈”、“学术动态”等栏目。

《东亚经纬》不仅是从事东亚研究的各界人士开展学术探讨和交流的平台，也是相关部门了解和认知“东亚学”领域重要研究成果的渠道之一。

为进一步提高《东亚经纬》信息质量和可读性，能够全面反映“东亚学”研究的现状，兹长期征集相关东亚的研究稿件。征稿要求如下：

- （1）稿件要求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内容充实，论证严密，语言精炼，资料详实；
- （2）稿件必须由作者（或合作者）完成，杜绝抄袭。字数以 2000—3000 字为宜，优秀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要求；
- （3）稿件中如有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际标准，尽量不用图表；
- （4）一般不使用注释，如有引文，可在引文后加括号，注明出处（按作者、文献名、期刊或出版社、年月顺序）；
- （5）附上作者简介，信息包括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联系方式等。

本刊收到稿件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阅，并通知作者稿件处理情况。稿件一经采纳，本刊将略付薄酬。

投稿邮箱：youno2014hz@mail.zjgsu.edu.cn

邮寄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 18 号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邮编：310018）

《东亚经纬》编辑部